

阅读与革命

——基于晚清新加坡与上海报界关系嬗变的考察

王 琦

【摘要】阅读行为是考察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一个有益视角。晚清时期新加坡与上海两地报界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而阅读是重要推动力。新加坡报人具有读者和写作者的双重身份，通过报刊阅读展开与不同上海作者兼同行的思想对话，完成了“臣民—弃民—遗民—国民”的自我认同转变，从主流舆论场边缘的追随者一跃而成为海外革命舆论中心的急先锋，勾勒出清晰的思想脉络与行动逻辑的演变轨迹，展示出报刊阅读在时代剧变中的重大贡献。

【关键词】报刊阅读史；辛亥革命；交往认同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对华侨在民主革命中所做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而“报刊是舆论之母”则反映出孙中山对于报业在革命动员中先导作用的高度重视。从革命策略和实际历程上看，孙中山的海外活动均是从接触报界人士开始的，故此晚清海外报刊史的研究历来是学术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关成果颇多。^①然而

^① 相关研究可参见 Chen Mong Hock: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段云章:《戊戌维新的“天南”反响——以新加坡〈天南新报〉和邱菽园为中心》,《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转下页)

在传统革命史叙事中,研究者往往聚焦于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具体新闻传播活动,叙事模式较为单一固定,同质化、浅表化、碎片化的趋向明显,尚缺乏整体性研究和全景式审视。近年来,诸多学人不断倡导强化“本体意识”和创新研究范式,“中国的报刊史研究中,有关阅读的研究渐成显学”^①。出于工作需要,晚清时期的新闻从业者往往需要大量阅读各地报纸以广泛获取全国资讯,这对于孤悬海外的新加坡报人群体而言尤为重要。从目前现存的新加坡老旧报纸来看,本地报人已养成浏览、摘录与评论国内各地报纸新闻报道的长久阅读习惯,为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相对充沛的史料,故此阅读行为日益成为考察辛亥革命何以发生的一个有益视角。本文尝试跳出既有的研究框架,探讨晚清时期新加坡报人如何通过阅读行为实现与上海同仁的跨地域思想对话,从而在两地报界关系的不断演进中勾勒出清晰的“臣民—弃民—遗民—国民”的自我认同转变轨迹,实现从舆论追随者到革命急先锋的转变,以期在全新视角下审视阅读行为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并为推动当前大众报刊阅读史的宏观层面研究提供些许借鉴。

一、甲午战争前两地报界关系

新加坡是海外华文报刊的发祥地之一。1815年,《察世俗每

(接上页)期;深町英夫:《革命宣传在南洋——以新加坡〈中兴日报〉为例》,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6年;金绮寅:《简析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对南洋华侨的“反满”民族主义宣传——以〈中兴日报〉观点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彭剑:《清季宪政大辩论——〈中兴日报〉与〈南洋总汇新报〉论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王天根:《近代报刊与辛亥革命的舆论动员》,黄山书社2011年版;李海涛:《〈天南新报〉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等。

① 周叶飞:《“阅”与“读”:关于中国报刊阅读史研究的一点思考》,《史林》2021年第5期。

《月统记传》创刊于马六甲,被视为中国近代报刊之开端^①。此后《叻报》《星报》等相继创刊,新加坡成为晚清东南亚华文报业的中心。^②上海作为近代报业的发祥地之一,在19世纪90年代更是后来居上,取代了香港、广州而成为全国新兴的报业中心。^③两地海天茫茫,相隔万里,但报界人士却交往频繁、声气相通,其中阅读行为是联结双方的重要纽带。新闻的地域性促使两地报人展开相互合作,阅读彼此出版发行的报纸成为一种日常需要。如《叻报》创办于1881年12月,而1882年6月出版的《申报》即已引用该报文章。《新闻报》于1893年2月在上海创刊,而同年4月出版的《叻报》就已转载该报新闻。通过阅读行为,双方对彼此业界动态掌握颇为及时,即便细枝末节也了如指掌。如1893年上海机器织布局发生火灾,《叻报》持续予以关注,“上海机器织布局灾业已略登前报,兹阅《申报》所言较为详尽,爰再照其原文登录左方以供众览”^④,足见其阅读的细致程度。据不完全统计,1887年8月—1893年12月,《叻报》共引用国内报纸文章115篇次,其中《申报》31篇、《沪报》15篇、上海《益闻录》14篇,合计60篇,占到总数一半以上,而同时期《申报》则引用《叻报》相关报道56篇次。从内容上看,上海报人多关注新加坡报纸的南洋新闻,而上海报纸的国内新闻则满足了新加坡报界的阅读需要。

故此,新加坡报人堪称是上海报人在南洋地区最重要和最忠实的读者群体,同时又以作者的身份将前者所书写内容进行筛选、摘录与加工之后向侨界民众广泛传播。故此对于两地报界而言,阅读不再是仅发生在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更是公共领域的业务合作与社会交往行为,其影响也不再仅局限于知识精英群体,而是

① 彭红燕:《中国新闻事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② 王士谷:《海外华文新闻史研究》,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5页。

③ 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④ 《布局被焚》,1893年11月1日《叻报》。

属于面向社会成员的大众阅读活动。双方相互影响,频繁对话,共同构建出一个融洽无间的“熟人社会”,如《申报》主笔何桂笙与《叻报》主笔叶季允意气投合,诗词酬答频频见诸报端。此后两地报界还在社会慈善领域积极合作,如1888年江淮旱灾期间《叻报》与《申报》遥相呼应,接连刊载上海道台龚照瑗与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的往来劝赈信函,倾心倾力向各界民众宣传救助义举。由此可见,新加坡与上海两地报界并未因处于相对独立、互不隶属的政治地理位置而相互隔绝,自成体系,相反却共同置于实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从而揭示出近代中国报界群体应是以共同体形态存在的,而非原子式的散布各地,互无关联,自生自灭。究其原因,实由近代报人多脱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所致,而士大夫共同体历来是维护传统“天一君一臣一民”政治体系的重要力量,因此两地报界都难以摆脱浓厚的“臣民”意识。传统儒家文化赋予了这一共同体正当性与合法性,使其并非单一的职业共同体,而是富有鲜明的价值与文化指向。故此,阅读行为所生成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满足了新加坡报人的深层文化需求,实现了与祖国故土在心灵上的同频共振,故此阅报行为日益常态化,成为新加坡报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二、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期间两地报界关系

对于晚清时期两地报界关系的演变过程而言,甲午战争堪称分水岭事件。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在战场中暴露无遗,被迫割让台湾的结局对漂泊海外的华人群体造成心理上的重创。上海报界多基于官方立场,着力于论证“弃台”的合理性,“中日两国议和立约,割弃台湾原属不得已之苦衷”^①，“彼强而我弱,彼既要我台湾,我

^① 《自称岛国》,1895年6月3日《申报》。

即不能不送。在朝廷视之,割弃台地并不足惜”^①。对于民众自发的抗日保台之举,《申报》则认为“倭之力征与否,我国固不复与闻。台之附从与否,亦非我国所能相强也”^②。上海报界建议民众秉持“旁观者”立场,“李伯行观察赴澎湖交换文凭已将全台交割清楚,从此中日可无龃龉瓜葛之患,局中之人转而为局外,倭人台民未知鹿死谁手,正不妨作壁上观耳”^③。然而新加坡社会与台湾具有相似的人口结构,均以闽粤籍移民为主,故此报人坚决反对割台求和,针锋相对地公开提出反驳,“一寸山河一寸金矣,人心如此,地利如此,再溯当日得之之难,又如此宜乎作壁上观之”^④。从阅读史的视角看,此可视为新加坡读者与上海作者之间的一次特殊的阅读交流与思想互动,展示出两地报人泾渭分明的认知态度。“乙未割台事件”留给新加坡报界难以抚平的历史创伤与焦灼不安的现实隐忧,逐渐孕育出强烈的“弃民心态”,将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仇恨转化为对清王朝无能的哀怨,“君之于民,犹父母之于子,台民何罪,而既弃之于始,复漠视终”,“吾尝谓台民之被毒不当怨日人,当怨皇上”,“中国轻弃其民之心则固显然公见矣”。^⑤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弃民心态”并未被化解和削弱,反而不断被唤醒。1900年,台湾抗日英雄简大狮在福建被捕,后被引渡至日本就义,“试观台北简大狮一事,不禁令人慨叹中国之官弃民如遗狗彘不食其肉矣”,“吾知自此之后凡洋人之夺我土地,踞我海疆者,而我华众将必专心外向,无复有义民出而效力者矣”。^⑥ 由此可见“弃民心态”已经固化为新加坡报界意识深层的内在心结,对原有的“大清臣

① 《论台湾自主之事》,1895年6月26日《申报》。

② 《和议余闻》,1895年6月10日《申报》。

③ 《论台事关击匪轻》,1895年6月11日《申报》。

④ 《论割弃台湾之失》,1895年6月5日《叻报》。

⑤ 《论中国弃民如敝履》,1897年7月14日《叻报》。

⑥ 《劣道弃民》,1900年4月6日《天南新报》。

民”意识形成了深远冲击。

在此社会心态下,新加坡报人的阅读行为发生明显变化。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等上海维新派报人成为最受欢迎的作者群体,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仅《叻报》就刊载了康、梁各类文章 19 篇,不遗余力地向民众传播维新派士人的政治主张,而《星报》《天南新报》等则不断刊发广告,宣传并代售《公车上书记》《戊戌政变记》等康、梁著作。《时务报》取代了《申报》成为对新加坡报界影响最大的上海报纸。据不完全统计,自 1896 年 8 月 9 日《时务报》创刊至 1898 年 6 月 11 日变法开始期间,《叻报》共计转载《时务报》相关报道 16 篇,而《申报》仅 4 篇。从读者角度来看,新加坡报人对《时务报》评价甚高,“中国新闻香港肇兴,上海续作,数十年北起天津,西达武汉,日出之报无虑十数家,大都诡俚其词,俳谐其体,架虚媚俗,含沙射影,有乖宏旨,难齐雅言。《万国公报》虽阐扬景教,势同泾渭而意存针砭,义亡畛域,其鼎鼎矣。《时务报》际中国创钜痛深之后昌言得失,最为易人”^①。以阅读为中介,变法开始成为新加坡社会舆论场的公共议题,但在话语建构方面两地报人并非完全步调一致,突出表现在新加坡报人公开对“君权”及“君主制”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较为推崇美式政治,“美为民主之国,人皆有权,人能议事”,“所定义事条例皆足以令人敬佩”^②,后期甚至提出“民权兴则君权替”的口号,“今后再五十年欧洲必有五六民主国发生,届时则今日所谓大君主国者必且灭亡”。^③可见新加坡报界政治诉求更为激进,并未止步于君主立宪制。

总之,阅读行为助力新加坡与上海报界关系走向深化,双方从社会领域中的合作伙伴演化为政治斗争中的亲密盟友。作为两地

① 《译报序》,1897 年 10 月 15 日《叻报》。

② 《译美国报论民皆自主》,1897 年 9 月 3 日《叻报》。

③ 《论今日中国之失权》,1899 年 8 月 31 日《叻报》。

共同的意见领袖与政治见解的书写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上海维新派报人在政治活动中居于核心地位,而邱菽园等新加坡报人则具有阅读者和追随者的双重身份,与前者保持密切联系,频频互动,深度参与了变法活动。然而后者为“弃民”心态所萦绕,对政治变革更为渴望,态度更为激进,展示出与前者截然不同的精神面貌。可以说新加坡报人作为阅读者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康、梁等上海报人的政治主张,但也折射出其以往“大清臣民”的政治信仰已明显动摇,并且随着政治变革运动的失败而滑入更为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之中。

三、义和团运动期间的两地报界关系

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意识”在上海舆论界广为流行,“它对当时清朝统治的‘向心力’仍大于‘离心力’”^①。然而此期间新加坡报界却萌生出“清亡自保”的观念,彻底表现出对中央政府的疏离和冷淡,是“离心力”大于“向心力”。

维新变法失败后新加坡报人对时局持极为悲观的态度,对祖国未来命运忧心忡忡,“盖前之所在未露圭角者犹以分取非洲之事未了,故其心尚可从缓,今则已专注于我矣,其势不更危迫哉”^②。以“三门湾事件”为标志,新加坡报人研判西方已将“瓜分中国”的战略妄想付诸实践,“自意国请索松门湾后,各国即纷纷而起,欲向中朝讨地”,“噫!中国瓜分之举其殆韧于此耶”^③,并且笃定在中西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国人已在劫难逃。此后大量所谓“黑眚之山河已兆,红羊之浩劫将临”“地运将日趋于南”“国家定鼎将三

① 戴海斌:《晚清人物丛考(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93页。

② 《罪言》,1898年4月20日《叻报》。

③ 《瓜分局韧》,1899年3月31日《叻报》。

百年,于兹周德而既衰矣”等谰纬谣言频频出现在新加坡各大报端。1900年1月16日,《叻报》首次直白地出现“今清天命已绝,清之光绪与明之崇祯将无同”的文字表述,标志着“清亡论”正式成为了新加坡民众的公共议题之一,折射出海外华人社会对清政府的政治认同已面临崩塌。“割辫改籍”遂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今意又索松门湾,中国军务不振,无敢违抗”,“倡议者引以为耻,遂兴割辫之议,以示不服清朝”。^①

“东南意识”与“清亡自保”的思想鸿沟重塑了两地报界关系。新加坡报人与康、梁等人彻底分道扬镳,甚至不无嘲讽地调侃“仆每想‘保皇会’三字宁可改作‘保自身会’方为合理”^②。《申报》等老牌报纸逐渐淡出视线,而新创办的《中外日报》《同文沪报》《苏报》则立刻被纳入新加坡报人的阅读视野。以《天南新报》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该报在1900—1901年内共计转载《中外日报》文章104篇次,《苏报》45篇次,《同文沪报》43篇次,表明双方在近代民权观念、进化论与联亚主义方面拥有诸多共同话题。新加坡报人呼吁海外华人要“亟图自保之策”,“谋自保之方”,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否定清王朝的正统性,“满洲入关定鼎,已取我汉人数千年之旧法而变之久矣”,“中国为戎固已在二百年前哉”,^③失国怀旧之情溢于言表。《扬州十日记》之类的有关明清易代的文章开始频繁见诸报端,而郑成功等人也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人物,《天南新报》曾不惜篇幅分15期连载《郑成功传》。该报另一篇有关拓殖南洋的华人领袖林道乾的文章则无视基本历史事实,极力将其刻画为满洲入关后的受害者、避难者以及复仇者形象,旨在呼吁海外华人勿忘前贤,“安知其不易服改发而复其本来面目,仍为中朝之赤

① 《割辫通议》,1899年5月22日《叻报》。

② 《来札照登》,1900年11月21日《叻报》。

③ 《不认祖宗》,1901年2月7日《天南新报》。

子”^①,实质上淡化了新加坡华人多为清末经济移民的历史真相,于无声无息中建构出明末政治难民后裔的自我认同。同时《苏报》等宣扬的进化论被新加坡报人广泛接受,从而使得议题并未落入“反清复明”的窠臼,反而赋予了“文明/野蛮”“进步/停滞”的新意。“物竞争存,优胜劣汰”,“有进化之世界,无阻化之世界,有文明之世界,无野蛮之世界”,^②“满人初非文明之族,后习中国教化,渐致文明”,然而“联合之力因之涣散,遂成退化之局”,“今于泰西各国均以夷狄鄙之”。^③以“遗民”自居是新加坡报人主动放弃“大清臣民”身份后重构自我认同的关键一环,而此后围绕着自称问题的进一步争论则拓展与强化了这种全新的自我意识。如邱菽园等人主张“不称中国而称汉种”,并认为“五大洲黄白黑三种皆出自汉种也”,“生人之祖厥推亚洲,亚洲之生厥推黄种,黄种诸国惟中国文明最为先启”,^④主张对日亲善,显然受到上海报人章太炎思想的影响。

四、“苏报案”对两地报界关系的深远影响

作为近代影响最大的报案,“苏报案”历来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相关成果颇多,但鲜有论及此案对南洋侨界的影响。事实上新加坡报界对此案反应强烈,《叻报》先后在头版发表《译文汇西报审判〈苏报〉案情》《中国政府控告〈苏报〉等条款》等评论文章,对清政府的封报抓人的举动提出公开质疑与批评。《天南新报》也陆续发表《申明〈苏报〉案情》《论〈苏报〉馆封禁之非》的批评文章,对章太炎等人深表同情,对清政府大加抨击。一时间,如何营救章太炎等

① 《大年访古续记》,1900年6月28日《天南新报》。

② 《新世界说》,1901年3月1日《天南新报》。

③ 《满洲鬼话》,1901年1月18日《天南新报》。

④ 《读〈黄帝本纪 六续前稿〉》,1900年12月5日《天南新报》。

“六君子”成为新加坡各界人士热议的话题,其中尤以陈楚楠、张永福两人最为积极。陈楚楠提及此事曾说过,“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兄弟年纪尚幼的时期,只偶于父老茶余酒后,陈述故事的时候,得一闻其说。兄弟和张永福同志本属近邻,竹马之交,长大就成了知己。我们后来得和邱菽园先生做朋友,并由他介绍,得阅《清议报》《新民丛报》《开智录》等书报,得了些现代的新知识。后来读了上海《苏报》和邹容先烈的《革命军》,民族的观念遂渐深入脑海,革命的思想亦由此油然而生”^①。另据朱镜宙(系章太炎先生女婿)所述,张永福本人对章氏极为崇拜,“一语及章先生,张即赞不绝口”,甚至曾对其直言相告,“彼之加入同盟会,得《民报》章太炎先生文字启发之力最多;国父影响,尚在其次”,^②由此可见作为读者的陈楚楠、张永福通过阅报行为对远居上海的报人章太炎萌生出强烈认同感和情感共鸣,促使其积极参与营救活动。不仅如此,两人在“苏报案”的直接刺激下还筹资在新加坡创办了《图南日报》,而该报被视为“南洋革命党报之元祖”^③。之后《中兴日报》《星洲晨报》相继创刊,革命派报纸正式登上新加坡的政治舞台。保皇派也随即创办《总汇新报》与之对垒,自《星报》《天南新报》相继停办后《叻报》一家独大的局面被彻底打破,新加坡报界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正式进入“党派报纸时代”。不同政见的报人之间多次爆发大规模论战,对此《叻报》主笔叶季允颇为感慨:“今日作报较诸十年以前,难易相去不啻若霄与壤。盖昔之为报,但求持论公平,据理纯正,纪事切实,即人无闲言。今则不然也,志趣不同,趋向各异,党派林立,竞胜争长,攻讦时间,各怀冰炭。报章论议,遂有种种艰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海外潮人史料专辑(汕头文史 第八辑)》,政协汕头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 年版,第 196 页。

② 余杭章太炎故居纪念馆:《章太炎逝世八十周年暨章太炎故居保护开放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76—377 页。

③ 冯自由:《革命佚史(上册)》,新星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9 页。

难,得无党之所欢迎,即不免为有党之所攻击。获此党之所赞美,即不免受彼党之所排挤。”^①诸次论战加速了国民意识在新加坡社会各界的兴起与传播,推动着南洋地区率先成为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之一,对此学界已有定论,此处不再赘述。

“苏报案”直接导致了革命派报人在新加坡的根植与崛起,彻底颠覆了两地报界以往的交往模式。在革命/反革命的话语体系中,《中兴口报》《星洲晨报》等革命派报刊更倾向于将传统上海报人视为政敌而非伙伴,加之这些报纸普遍生存期较短,难以与外埠同行保持长期交往关系。而《叻报》等老牌报纸则陷入于本地报人的多番论战之中无暇他顾,鲜见与上海报界再有频繁合作或人际互动。因此,从总体上看“苏报案”之后两地报人渐行渐远,关系日益疏离,然而从阅读史的角度看,《图南日报》的创办意味着陈楚楠、张永福完成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角色转变,《苏报》虽被查封,但是章太炎等人的政见主张却为革命派报人所继承并广为传播,最终促使新加坡成为辛亥革命的南洋舆论中心。可以说,陈、张两人的经历充分展示出阅报活动对于晚清海外普通民众的深远影响。

五、结 语

1935年5月7日出版的《总汇新报》发表《值得景仰的五位报人》一文以纪念报业前辈,除梁亚发系本地报人外,其余梁启超、章太炎、宋教仁、黄远生四人的新闻职业生涯均与上海密切相关,近代上海报界对新加坡同仁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并非所有的上海报人都可纳入后者的阅读视野成为对话伙伴,从《申报》何桂笙到《时务报》康、梁等人,再到《苏报》的章太炎,对话伙伴的交替更迭显示出新加坡报人的交往选择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任

^① 《作报难阅报尤难》,1909年2月4日《叻报》。

何人都不能脱离其他人同他共同具有的相同性来建立他自己的同一性”^①，以阅读为中介，新加坡报人在与这些不同上海报人兼作者群体的交往互动中率先完成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认同转变，并发挥舆论引导作用促进民众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之中。因此，在华侨成为革命之母的历史过程中，阅读活动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王琦，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7 页。